

王晓明 王海涓 张寅彭 编

胡河清文集

上卷



有了这种文化上的“通”，就一通百通，很容易就通到文学上。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创造中国文学的
“旧邦新命”。

胡河清

上卷

胡河清文集



王晓明 王海渭 张寅彭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胡河清文集 / 胡河清著; 王晓明, 王海渭, 张寅彭编.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ISBN 978 - 7 - 5336 - 6304 - 9

I. ①胡… II. ①胡…②王…③王…④张…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2110 号

胡河清文集

Hu Heqing Wenji

出 版 人: 郑 可
质量总监: 张丹飞
策划编辑: 何 客
责任编辑: 何换生
封扉设计: 刘运来
美术编辑: 吴亢宗
责任印制: 何惠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 (0551) 63683012, 63683013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60.25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 序

二十年后纪念胡河清的意义

在胡河清去世二十年之际，他的收辑文字更为齐全的新版文集编成问世了，可谓适逢其时。

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九日，那个夜晚，窗外春雨淅淅沥沥，屋内灯火昏暗。他半躺在床上，平静和缓地与我谈着往事，甚至还提起我在大学时常穿蓝色的服装、我的那篇给他留有印象的写杉树的散文之类琐事。当时我虽然稍感不安，但他的安然的语调还是未能使我觉察他这是在诀别……

河清去世后，他的母亲徐清辉先生曾说过，他的离去是对我们大家重重的一击。逝水如斯，在他身后重读他留下的文字，益发感觉到这句话的沉重。

河清这部文集的性质，二十年后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实际上是一部自具内在完整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更为确切地说，是共和国所谓“后三十年”的前十五年的文学史。河清作为当时的“旁观者”，入其内复又出其外，极其客观而又以他个人的阅历、学殖、修养、境界，关注与评论了活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新老作家，其中如洪峰、马原、史铁生、贾平凹、孙甘露、汪曾

棋、孙犁、杨绛、钱锺书等，都写有正式的专论；又以“东方文化人格美的传统”、“道家文化智慧”、“术数文化”、“土包子旋风（实即中国农民心史秘观）”等历史文化性质的专题，评论了阿城、莫言、张炜、格非、苏童、余华、李锐、刘恒等人的作品，上述专论中的马原、贾平凹两位，在专题中也被再度审视。在深刻把握作家作品的基础上，他明确地划出一九八五年这一年，作为中国文学个性话语系统作家作品“解构”高度统一的指令性文学的分界之年，这是他这部史的开端；又以其逼近二十一世纪的敏锐，提出了一个前瞻性的“中国全息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为他的“史记”划上了一个开放至下世纪的句号。这部满溢着改革开放八十年代气息的文学批评集，如果就其鲜活的风格、批判性的深度和建设性的宽容而言，我觉得可与勃兰兑斯的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比。

河清的所谓中国全息现实主义，按我的理解，应该就是一种融通古、今、中、外文化，同时又通于人的生命精神乃至天外星系神秘系统的“全通”的化境。他以《红楼梦》作为其开山之作，又指出诸如张炜的小说《古船》、杨炼的诗《太阳与人》、徐冰的美术作品《天书》等，都是当下已经出现的带有全息主义倾向的作品。而我也愿意接着说，河清本人的文学评论，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全通、全息性质的作品呢。

河清身后的二十年，进入他所憧憬的二十一世纪也已将近十五年。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国门开放得更大，考古发掘和古籍整理也取得长足的进步，探索星球的火箭飞船也已接二连三地发射上天，尤其是社会人间互联网络的发达，四通八达的技术条件似乎都在大为优化，如此则文化、文学艺术的全息主义创作的现状究竟变化如何呢？由于我是一个“不通”的人，我过去有关当代文学艺术的讯息大都来自河清，隔膜既久，自然无从置喙。但我想仍可回到河清这个倡导者的原点来予以探讨，我们来看看河清是如何“全息”式地通的。

河清在他生命最后八个月里为《灵地的缅想》所写的那一篇自传性质的长序，我以为就是他本人身体力行文化、文学“全息”创作的一份实

录。这篇通灵之文现在仍作为新编文集的序置于卷首,读者开卷就可以读到。而在二十年中已经读过此文的人中,据我所知,不分男女,无论老幼,也不限弄文字或不弄文字的职业分别,读后无不心摇神驰,为他极坦诚而又极高华的人格文风所折服。

这篇文章几乎是活的、有生命的。你可以说他用尽了一切文章技法而不着痕迹,但我觉得他这是拆解了技法随其生命精神行于当行,止乎当止。在他永远是生命精神第一。他把自己从事文学的决定写得如此沉重,但同时也像文学本身那样美丽。大运河边的古老房子,里面的线装书、青花瓷着实诱人。但我们看到,河清后来的文学批评更多关注的,是这座老屋墙上“开出的无名野花”,他试图用野花的生命力来驱遣里面同时存在的无常和阴影,使这座“老屋”重新焕发出青春。这使他的文学梦凄丽复又壮美。一九八五年中国文学在“文革”浩劫之后的开放气氛中蓬勃兴起,河清说:“我的年轻的心也为全民族情感生活重新苏醒的景观所吸引,于是一枝拙笔也染上了几分春色。”这是何等的情操襟怀呀!二十多年后回首那个难逢的年华,我不能不深为钦佩河清毅然投身文学的决定是敏锐和适时的,但也未尝不为这背后的艰难和牺牲一掬同情之泪。这也可以理解,他后来的评论文章虽然独一无二,无一篇不有他个人的风采,却又是最具公心因而也是最为大气的。他大义凛然同时也问心无愧地说:“我同中国当代最有才华的作家们的精神对话都不带私交色彩。”这是一种在当下中国从上到下最难做到的品格和行为,但却又是百业的底线,否则人将不人,国将不国。河清和他的文字,真是周濂溪笔下那一枝出泥淖而不染的荷花啊。惜乎千年之后还是那么稀而贵。

河清又说:“如果调动自己的古典文化积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中国当代文学,兴许会对中国文学的重建作出某些独到的贡献。”这个古代文化的角度,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而言,本应是最为正常和基本的。试想,分析和认识一个国家的当下现象及其精神成果,怎么可以不

首先从它的历史入手呢？可惜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认识自己的老祖宗了。曾几何时，从我这一代人开始，中国历史被描绘和教育成除农民起义外都是负面资产而被彻底否定了。本来毛泽东说过的一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总结”的正言，竟然变成了一面神话中把人照成鬼的魔镜。如今我也一只脚踏进了老年的门槛，可见这个问题的积重难返已经到了何其严重的地步！所以河清郑重地一一交代他从《周易》、《黄帝内经》、老庄、佛典、古典诗文获得的文化滋润，就决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一条修养途径。他在这篇文章中没有说到儒家的典籍，其实他对孔子、《诗经》等都是十分熟悉的，对早期儒家的简朴切要也都有正面的理解和评价，这些在读他的评论文章时常常会遇到的。他最后在文章的末尾交底说：“有了这种文化上的‘通’，就一通百通，很容易就通到文学上。”他以自己的当代文学批评之路，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个“全息”性质的结论。

当然，河清继承、运用传统文化达到的出神入化的程度，并不是轻易可以学就的，即使他本人也经历了废寝忘食甚至出生入死（决非过言）的历程。他的天分之高自然是一个先决条件。但除此之外，他那纯洁至诚的性情也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他是以全副的真诚来追求真理、投身学习的。我这样讲或许过于沉重，或许未及河清还大有的清逸、幽默的一面。但他的生命以赴的认真，确是我所体认到的他的精神品格的主要方面。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及具体书籍的征引，容或会有细节方面的出入，但在实质的把握上是决无差错的，往往能掌握其正面同时扬弃其负面。他从小就有一颗孤独之心来承受世态的炎凉，但也未能伤害到他那一份高贵的真诚。他的批评文字对于批评对象的用心之诚，相信八十年代那些同样真诚的作家们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河清与他们的精神对话，正依赖于这样一个基础。至诚的品格所导致的大公的立场才是最可靠的。这是河清的批评能够同时达到深度和准确性的又一个基本条件。孔子当年曾经感慨忠信者

多而好学者少,这是古代;在今天则颠倒过来了,各种名目的“学习”满天下,而如河清那样的至诚君子则已如凤毛麟角了。这是当下我们感受河清最深的又一点。

古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河清就是这种大公至诚性格的传人。他在短促而紧张的对于当代文学的文化批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立场,即以道家 and 佛学为主进而融通西学的观点。这是他综合生命体验、历史学习和当下批判得出的结论。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批评只是载体而已,这个根本出路的探寻才是他的终极目的。所以他关于中国文化的意见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河清推崇道家的智慧和佛教的超然,又大抵以佛的慈悲来替代儒家的仁爱。他的思考,据我体会,主要是以如何弘扬个体生命力作为出发点的,所以也就可与西学打通了。他不取汉以后的儒家,尤其不满宋儒的所谓“主敬”和“主静”,而愿意回到先秦原创时期的孔、孟,这也都是基于生命力的强弱消长为转移的。但即便如此,他对道、佛两家的超脱所导致的泯灭生命激情的危机也保有清醒的警觉。他反对儒家,但对秦始皇的暴政和百家归“法”的憎恶也是毫不含糊的,并不如当下有些人还在鼓噪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的诳话,把刚刚身历过的最近一次“秦政”的浩劫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河清的这些认识,如果分别观之,可能不算什么创获;但合为整体,作为一个大判断,就显出它的准确性和建设性的意义来了。

河清对于儒家尤其宋儒的批评不免有误会之处。汉朝至武帝定下“独尊儒术”的大政方针,至此才算完成了与所谓“秦政”的实质上的区隔,从而奠定了此后以儒家为主流的百代文化的繁荣,这是有历史为凭的。而宋代理学则又是儒学融合消化了东汉以来传入中国的佛学后的新形态,与宋代市民社会的新形态相适应,在历史和文化上是又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表明儒学所拥有的持续的生命力。对此陈寅恪、余英时等

都有论述。但在清代中叶以后,在面临新的外来挑战之际,理学又转为不适应而需要重新调整了。戴震等清儒早在乾隆间便已直攻宋学;此后曾国藩虽重尊宋学,却也兼而面向西学;张之洞则转树荀子“劝学”之帜,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对于宋学的调整。而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现代反孔思潮,在大陆不断升温演变为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打断了中国文化内部儒学调整的动势。这究竟是为建设全新文化扫除旧障碍,还是导致了国人的断根失忆以至新路难以为继?目前仍看法两歧。我们如果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河清反对宋儒的意见,则他所持的仍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内部调整的立场,其意义在于由此出现了与西学真正融通的可能性,由同治光绪中兴时期提出的所谓“体用”关系,至此前进为现代相对等量的“双通”了。

河清的文学批评对象由当代略溯上去的是鲁迅和钱锺书,他的文化观也在对钱锺书的研究中得到了淬炼。钱锺书是一位今后几乎不可能再出现的贯通中西文化的人物。按照河清的分析,钱先生近道远儒,他是以道家的大智慧通于西学义谛的。但也就是在这一比较中,他极为深刻地指出,道家乃至钱锺书的超脱现实恶浊,所谓“返璞归真”的旨向,乃是返归于孩童的天真。这虽也可使艺术保持难得的童趣,却尚未向前达到西方文化中那一种近于迷狂超拔的信仰之境。换言之,道家之学也仅通于西方的非功利之学而已。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钱锺书得自于西学的生命自由意志,已达于歌德塑造的摩菲斯特之类“否定的精灵”的现代程度,足以支持其在“破”的一面对中国文化的核心“天命”观展开批判,但却未能在“立”的一面与他浸淫其中的道家之学融合为一,仍然未达钱先生自树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化境。河清对此的总结则引陈寅恪先生“道教之真精神”与“新儒家之旧途径”之说,并以此语命名他的钱锺书研究的专著而无所顾忌,表明了他的结论。陈先生此说确是中西文化交融前景的不二法门。以河清的火眼金睛,果然是终归识得此门的。

河清不取儒家,但对孔、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孔子著《春秋》时的那句话:“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我想河清一定喜欢。在我心目中,他的当代文学批评,也是这样一部直得八十年代人心“大义”的史著。

多年前,晓明、海渭和我三人合编了一部胡河清的《文存》,收集了《灵地的缅想》和《真精神 旧途径》以外的大小文章,以及朋友们的悼念文字。由于这个缘故,此次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何客先生希望我们继续来编他的新的文集。但实际上由动议到编排到出版,都是何客先生操劳的,前后历时六载,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保管多年的河清的遗文和照片,此次也选择了一部分,附辑于后。何客先生又搜集到二十年来络绎发表的纪念河清的文章,与当年《文存》中的友人文章一起,按时间先后排列成一辑。这使我们看到,原来河清这二十年里一直存活在大家的心中。河清虽然不在意什么文章功业,但他还是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炽热的生命精神体验,诚实地呈现于更年轻的朋友们之前的。他希望和他们一起分享他曾经有过的关于中国文学的梦幻。河清热忱地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梦境,这是每一代文学拥有的永恒的主题。”写到这里,我愿意坦白,我为河清的这番心意而忍不住老泪纵横,就此打住吧。

张寅彭,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九日前夕

写于白蜆江边一座黑瓦白墙的屋子里

序 言*

我自从发表第一篇有关文学的论文迄今,已有八年之久了。八年之间,我舍车徒步,漫游于平沙落雁、渔舟唱晚的人生风景之中,常常忘却了被曹丕称为“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功业。然而推托不过挚友的一番心意,竟也得了收一个集子的机缘。在感到意外的惊喜之余,也不由地想起一些久藏心间的往事。

在为編集这本小书提供个人背景资料时,我的一位老朋友下意识地教导我填出生地说:“上海”。其实则否,这使他都大出意料。我的“血地”是在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之滨。我母亲是一位很有诗人气质的哲学研究者,当时看到报纸上出现了“河清有日”的豪言壮语,以为从此黄河变清有望,于是就有了我现在的名字。后来我刚刚满月,就被外祖母抱到上海来领养。在三十一岁的时候,我有幸碰到一位密宗佛教的高人,她见了我就大嚷:你怎么倒是活下来了?你这个人要是一直待在“血地”是很难存活的呀。这倒似乎说得有点入谱了。因为我满月时就离开了那块大西北的“血地”。如果继续呆在那儿,便正好凑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席卷西北黄土高原的时代,一切就很难说啦。当然从小斗雪

* 本文原系胡河清为《灵地的编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所写的自序,亦是一份独特的个人自传,移此作《胡河清文集》序言。——编者

熬霜，身子骨比现在锻炼得更结实也未可知。

以上都是闲话。奇怪的是，我文学意识的最初觉醒，也发生在那片黄河之滨的古老土地上。我在大约十五六岁的时候，又回到了生养我的地方，度过了一段艰难而有意味的时光。我当时穿的衣服在班上是最褴褛狼狈的，这可以充分表现出家境已是如何的凄凉。我以幼小的年纪，挑起了家庭中几乎所有的生计。西北的寒冬，大白菜的金贵非一般江南人所能想知。有一位和我一样从上海来彼地借读的同学，于某个大雪天抱了两棵没有冻坏的大白菜来送给我，我对他的感激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我常常在风雪交加的夜晚骑自行车路过咆哮的黄河，远处是黑黝黝的万重寸草不长的黄土高山，归路则是我的已经感情分裂缺乏温暖的家庭。所以我当时最好的归宿大概还是徘徊在离生我的产院不远的滨河路上，看看黄河的冬景。然而青春的火焰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熄灭。我第一次写诗的灵感，就是那时被严冰之下奔腾不息的黄河唤醒的。至今我还保存着在西北的一些少作，虽然技巧的稚拙使我不敢将它们公开；而对于我自己，却是永恒的青春の忆念。我还似懂非懂地偷读着家藏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面对黄河上的茫茫星空，我也曾想过，自己命运的星座安在呢？有一位西方大科学家的话使我神往不已：科学的发展，甚至使测量银河系每一颗行星的距离都易如反掌，但科学却永远无法解释星空何以带给我们如此崇高的美感。感受星空的美，就是诗人的使命了。这怎能不使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怦然心动呢？

不过那时我的内心还是很崇拜科学。从很幼小的时候起，我就具有一种面对宇宙人生之谜的疑惑。对于我来说，解答诸如宇宙有没有边际、人死后灵魂的去向等问题，早已成为一种生存的需要。中学时代，我还不懂得这类问题其实更多地是由哲学家与宗教家来进行深思冥想的。少年气盛的我，认为科学的未来也许会用实证论的方式提供关于这些形而上命题的答案。于是立志将来向自然科学方面发展。母

亲也很鼓励我向这方面发展的志向。我母亲出身于江南有名的“状元及第”之家，然而明清以来家族几度遭到文字狱的扫荡，也许在血缘深处就潜伏下了对于文字生涯的恐惧的种子。她在哲学和文学方面的高深造诣，我迄今仍保持着充分的尊重。然而她对于自己选择人文学科，也是有追悔的。几度国变，到了七十年代初，她已经打算改教英文为生了。对于我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兴趣，她自然不会反对的，加上送我大白菜的那位同学，他父亲是核物理专家，也有将来当科学家的志向，于是我们碰在一起，便大谈爱因斯坦、罗素、海森堡、哥本哈根学派之类，可谓痴狂矣。

有人认为，中国南方倾向于科学与理性，北方则富有内向的人文气质。我的经历却与此有所相悖。数年后我回到南方，在一座烟雨迷离的江南小城中呆了一段时间，竟将伟大的科学家之梦消磨殆尽了。那时的江南小城，基本上还处在古典诗性文化的松散气氛之中。下了班，几个朋友喝喝黄酒聊聊闲天，不消多少钱就能提一篮鱼虾莲藕回家，实在舒服得可以。我在无意中得了一本页子已经发黄的陆维钊所选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文选》，每天翻看着。其中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特别对我的心境。西北严峻的生存环境与江南小城的悠闲情调，大抵有天壤之别。“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身上一种隐士的暮气就是由此被触发起来的。如果鲁迅先生九泉有知，大概会把我当作一个“青年不可读古书”的反面例子吧。而就我自己而言，又岂不因为沉湎在陶渊明之中荒废了数、理、外文而痛悔莫及呢？所以在现当代的作家中，我一直最崇拜鲁迅。他说的话，才算得“良药苦口利于病”哩。

后来我又回到了上海。中学最后一年，我在上海准备高考。这是刚刚恢复高校考试制度后的第二次高考，人们似乎都怀着宗教般的虔敬心情像在准备一个神圣的典仪似的。那时的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我“作文很好”，于是便给我安排了另一个也是“作文很好”的同窗。这除了有让我们相互促进的好意之外，据说也有

些中国古老的平衡术考虑在内的。不料大出这位老师的意外,我们不仅没有“文人相轻”,反而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其实我很早就流落江湖,受到中国北方普通人民“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哥们儿义气的熏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矫情傲气倒是已不剩多少了。我的那位同窗呢,是个很有魅力的小伙子,身上既有天生的演剧才能,又有出身高贵门第的自尊感,很少小心眼儿的。他母亲是一位妇孺皆知的越剧大师,父亲则爱好藏书,可以算得风雅的学者。我们一见如故,亲密之情如同手足。补充说一句,后来我外祖母临终的最后一夜,便是他和另一位好朋友一起同我守候在床边的。像我这样亲缘淡薄的人,如果没有这样一帮铁哥们儿处处扶持着,哪里有今天哩。中学毕业前夕,他邀请我到他祖父在无锡故家的旧屋里作客。那是一座坐落在大运河岸边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房子,已因无人居住而关闭多年了。二楼的落满尘土的会客厅里面,堆满了旧式家具、线装书、文房四宝。窗外大运河浩浩荡荡,秋水共长天一色。皓月当空的时刻,我们小饮了几杯。他告诉我,他祖父曾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潜往苏联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劳工会议,见到过列宁,但回国以后却失去了同组织上的联系。后来当过长时间的大学教授。当时他祖父还健在,虽年逾九十,精神却还矍铄。看得出是一位饱经风浪、很不平常的老人,不过我没有想到他的历史这样复杂。等讲完了他祖父谜一般的传奇生涯时,我们都已酒入微醺了。我们一起下楼,沿着水势浩渺的大运河向前走去……望着在水中缓缓而行的明月,我终于作出了生平最困难的决定:将来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职业。

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这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然而,旧士大夫家族的遗传密码,也教我深知

这所房子中潜藏的无常和阴影。但对这所房子的无限神往使我战胜了一切的疑惧。

记得苏东坡曾经说过类似意思的话，名山虽好，不如卧而神游之。这句话确实很对我的性情。我不能遍游天下的名山大川。然而在梦里，我却神游过不少幽深奇诡的境地。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我收到了一位云南画家朋友寄赠的照片。这是他在西藏浪游时摄下的。他具有希腊古典时代运动员一般健美的体格，所以能一直爬到珠穆朗玛峰的雪线附近。看着他在高峻的冰川前璨然微笑的照片，我不由得心驰魄荡。这天晚上，我梦到自己骑上了一头漂亮的雪豹，在藏地的崇山峻岭中飞驰。一个柔和而庄严的声音在我耳边悄悄响了起来：“看！且看！”我听到召唤，将头一抬，只见前面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幻化出了一轮七彩莲花形状的宝座。可惜那光太强大、太绚美，使我终于没有来得及看清宝座上还有什么别的。听说藏地常有异光出现。我不知道宝座周围的光晕是否就是佛光。然而有一点大概是不错的，我即使有缘窥见一线神光，那也肯定是在梦的旅行之中。

为了纪念我的梦，姑且选择《灵地的缅想》作为这本集子的题目。

当然，“缅想”也是一个有缺憾的题目，表现了我的文学旅行的虚构性。在少年时代，曾因母亲的推荐而读了瑞典人斯文·赫定的名著《亚洲腹地旅行记》，为他的冒险经历神而往之。我决定以后也能做一名深入中亚腹地的探险者。为此我曾在中国西北部天寒地冻的山间长途骑自行车旅行，在零下十多度的冬天打开窗户睡觉，还曾试图拜一位河南南阳籍的火车司机为师学少林拳等等。可这一切尝试最后都失败了。因为突如其来的身世变故使我失去了涉足高峻深远的灵地探险、游历、朝圣的机缘。我的文学旅行不过是一场梦游。我曾为马原先生的小说写过两篇评论。把他比喻为第一次进藏的瑞典冒险家斯文·赫定。他哪里知道，这里头藏着我多少暗中的嫉妒！马原写过《虚构》，然而这毕竟是他进入西藏以后才“虚构”出来的。我呢，那些关于他西藏小说的

评论,才是地地道道的“虚构”。这本集子,可以说就是我的精神梦游录。

精神上的曲折经历,使我加深了对于宇宙人生的内心体验。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游历的不足。

此外,我还喜欢“游心”于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之中。记得进大学的第一年,我在图书馆首次借的书便是《庄子》。少年时代的艰辛,使我感到有必要在老庄哲学的净水中洗涤自己疲惫的心灵。“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在我当时的心像中,庄子就是这样一位稍有些女性意味的美男子。他做的“蝶梦”,似乎也不排斥生命感性的成分,这使我感到亲切。后来看到庄子的画像,一般都把他画成长着大胡子的高行长老,才彻底扫除了我的青春偶像。

又有一段时间,我迷醉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在唐诗中,我比较偏爱晚唐的许浑。他的名诗:“劳歌一曲解行舟,青山红叶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写得令人黯然销魂。因为喜欢这首诗,便求了一位南帖北碑造诣都很深的朋友写成条幅,迄今仍高悬在我的卧床之旁。忆及自己的前半生,风和日丽的良辰美景甚少。然而风雨之夕,得到温馨的友谊,却是常有的事。还有什么比站在日暮时分的江岸上,目送所爱的友人行舟远逝而更使人惆怅呢?

在一个对我来说是十分神秘的春天,偶然得到了一本《黄帝内经》。读这本书的感觉,似乎被一只灵异的手指打开了天眼。虽然为时短暂,我却有机会看到了隐含在人类精神隧道中的某种秘景。我从小就居住在上海一所历史悠久的公寓里。童年时代时常被剥落的粉墙上爬行的光斑所惊起,似乎四周潜伏着难以计数的幽魂。阅读《黄帝内经》的经验使我好像复归到儿时神秘的夜晚,又沉浸到充满亡灵传说的遐想之中了。

随之是一九八六年,我那时经常失眠。在那些不眠的夜晚里,我常常望着花园中老槐树诡秘的黑影,憧憧而思。这所百年以上历史的西

班牙式公寓是当年李鸿章的私产。“文革”中竟有人揭发李鸿章的遗骨就埋在这棵老槐树下。大概这种传说过于离奇，连造反派也终于没有去认真挖掘。但这所房子秘藏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则是确的。我尝试想写一部题为《白楼梦》的长篇小说，记录下我出生以后大部分时间住在里面的房子中的传奇。限于才力，我的这一心愿迄今未了。

为了从纠缠我的梦魇中解脱出来，我开始阅读佛典。释迦牟尼智慧的声音，使我一颗被残酷人生揉碎了的心得到无限的慰藉。我也尝试用毛笔临绘佛像。虽然笔迹还很稚拙，然而在同庄严的神像进行精神交流之后，心灵得到了甘露一般的滋养，我又能入眠了。

我最先读的佛典是《金刚经》。这本经书的意蕴博大精深，使我洞见了佛法的伟大。“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又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是在说佛性从来不拘形相。在寺院大雄宝殿里正襟危坐的固然是佛，而佛又无时无处不在。他可能就在我们的书案之上，也可能在低矮简陋的竹篱茅舍之中，甚至行进在现代化的通衢大街上。《布施度》说：“众生扰扰，其苦无量。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寒衣热凉。于彼浊世颠倒之时，我当于中作佛。”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神性境界的慈悲呢？从此我不仅画佛像，也画梅花修竹、布衣凡夫、红尘女子。无论我们画什么，只要笔尖带着灵性，都会获得与神的秘密交感。上苍爱的光辉，就会从我们手指下流出。

我读的第二部佛书是《妙法莲华经》。“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我曾在苏州寒山古寺的断壁残碣间，为这两句佛偈的精妙所震惊。后来我在《法华经》的线装页子上重新发现了这两句话，有一种故友重逢的亲切。

经过前辈学者的指点，继后我研读了《维摩诘经》。作为很难摆脱入世气质的中国人，在我读过的佛典中似以此经最为亲切。接着又通读了《坛经》、《五灯会元》等禅宗著作。禅宗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交融后的产物，实际上即是从《维摩诘经》的文化法脉中衍生出来的。